

新 第11辑 国学研究

- ◎ 邓妙慈：《左传》晋国卿族研究
- ◎ 潘雨廷：《安般守意经》讲解
- ◎ 张文江：《五灯会元》讲记（三）
- ◎ 郭剑鸣：知识政治研究：从中西方近代知识机制的对抗看中国传统政治的解体
- ◎ 李金龙：罗果夫与中国现代文坛
- ◎ 邓如冰：女人与衣：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服饰描写研究
- ◎ 王富仁：樊骏论（一）

新 第11辑 国 学 研 究

XIN GUO XUE YAN JIU

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 编

中 国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国学研究. 第11辑 / 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编. —
北京 : 中国书店, 2013.8

ISBN 978-7-5149-0862-6

I. ①新… II. ①汕…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6033号

新国学研究(第11辑)

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陈 扬

出版发行: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100050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张: 24.75

书 号: ISBN 978-7-5149-0862-6

定 价: 48.00元

《新国学研究》辑刊

编者的话

“新国学”是在原有“国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西学”）区别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的“中学”，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有关中国古代学问的总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将“国学”与“国粹”区别开来，胡适曾经将“国学”界定为“国故学”，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化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包含在了“国学”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重新整理和研究，但胡适的“国学”也仍然是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而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1949年之后，除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还继续使用这个学术概念之外，大陆中国的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它，但这也使大陆中国学术和中国学者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感觉，从而将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发展到彼此无法相容的程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概念才再次出现在大陆中国的学术界，并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至现在，它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即它仍然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学问的总称。

但是，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诞生之日起，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又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主要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

识分子的独立创造，是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同样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国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之中。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中来，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的创办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在原有“国学”观念基础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只是要把这些成果纳入到“新国学”这个更大的学术整体中进行具体的阐释、理解和运用，以使之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学术的整体之中去。“新国学”也并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但这种争鸣和讨论的目的却不在争论双方一时一事的胜负，而在各自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整个民族学术事业的丰富和发展。《新国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作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样板而被刊发的，它只是给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以刊发2万—12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2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12万字，这就使2万—12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

更加多样。

由于人手的不足，《新国学研究》暂时只刊发特约稿件，不接受外来投稿。

《新国学研究》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目 录

邓妙慈

《左传》晋国卿族研究	1
------------------	---

潘雨廷

《安般守意经》讲解	73
-----------------	----

张文江

《五灯会元》讲记（三）	100
-------------------	-----

郭剑鸣

知识政治研究：从中西方近代知识机制的对抗看中国传统政治的解体	176
--------------------------------------	-----

李金龙

罗果夫与中国现代文坛	232
------------------	-----

邓如冰

女人与衣：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服饰描写研究	253
------------------------------	-----

王富仁

樊骏论（一）	327
--------------	-----

《左传》晋国卿族研究

邓妙慈

绪论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之简称，相传为传述“六经”之一的《春秋》而作，但《左传》的文学成就却远远超越了行文简质的《春秋》，被后人誉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有关它的作者与成书问题，在学界一直聚讼纷纭，本文不拟对此进行全面的阐述与评介，仅对与本文相关的若干问题略作交代，作为立论的前提与依据。关于《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提出是“鲁君子左丘明”，而关于左丘明的最早记载，则见于《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中仅可得知孔子在品评人物方面引左丘明为同道，却未涉及其身份与生卒年问题。司马迁之后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指出《左传》之作者左丘明乃“鲁太史”。此后，史书对左丘明的记载多沿袭司马迁与班固的观点，至唐代始有人提出异议。唐陆淳认为左丘明应是孔子之前的贤人^①，这样一来，左丘明依《经》立《传》的说法便不能成立了，由此而引起的种种驳议与立论更是不胜枚举，《左传》的著作权归属遂成为了千百年来之学案。在这个问题上，顾炎武先生的说法还是比较审慎与中肯的：“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②先秦典籍的成书往往要经历一个授受相传的漫长过程，不像后世的书籍往往由一人一时编定，且由于上古时代载籍混乱文献缺乏，古籍作者的身份往往会成为悬案。只要明确了这个前提，《左传》作者之确凿名姓就无关宏旨了。另外，某些学者提出的折衷观点其实正是对这个问题的隐性解决。赵光贤先生在《左传编撰考》中指出，书名既为《左氏春秋》或《左传》，其作者“不是左丘明，不妨其为左氏”^③。本文姑且采用这种说法，将《左传》之作者称为左氏。

此外,《左传》一书将春秋近二百七十年间的风云变幻,政治谋略、军事斗争、经济活动、文化交流、盟会聘问、天文历法、两性关系、伦理观念等庞杂丰富之内容均囊括其中,这种全方位的表现力和集大成的包涵性,大约只有掌管着国家文化机构和掌握了第一手历史材料的史官阶层才有可能完成。

大致确定了《左传》作者的身份后,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左传》的成书年代。现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发表了诸多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春秋末年说”与“战国中期说”两种意见,笔者以为可采取沈玉成、刘宁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的模糊说法,即《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④对于“战国中期”这个最终编定时间的确定,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前人论之甚详的《左传》之预言与卜筮。但“战国中期”之具体时间段的划定,又是众说纷纭难定一尊。程水金先生将此时间段划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初命韩、赵、魏三家为侯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前379年)陈氏代齐之前的二十余年之内^⑤,笔者以为这是较为合理的界定,其他细节,可参见程水金先生的《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一书。

于是我们大体可以确定:《左传》之作者左氏应是鲁国的太史,《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是原创者与授受者共同创作之文化成果。解决了《左传》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那么《左传》到底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述,还是阐释《春秋》的解经之作呢?这是让历代学者争执不休的一个问题,而这场争论从西汉时期就开始了。

西汉宣帝以前,以阐释《春秋》经义为主的今文经《公羊传》、《穀梁传》皆立于学官,西汉哀帝时,刘歆奏立古文经博士,其中就有《左传》。刘歆此举遭到了今文经学家们的激烈反对,理由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⑥,而刘歆本人则“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⑦,而他也积极证明《左传》在发扬大义方面不弱于两传。可见不论是《左传》之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他们心中,《左传》的有无价值就在于是否阐释经义。那么,《左传》到底是独立成书还是依经立传呢?

笔者以为,《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一样,皆是解释

《春秋》之作，但其解释的方法迥异于二传。《公羊》《穀梁》均是微言大义穿凿附会，竭力从《春秋》简短的记述中挖掘出美刺褒贬之万世规律，它们是重义不重事。《左传》则是以记叙史事为主而解释经义为辅，故引来诸多非议与质疑。其实只要不存经学家们的门户之见，并不难看出《左传》是不能离开《春秋》独立存在的。汉桓谭在《新论·正经》中言：“《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⑧《春秋》若离开《左传》，便成了简单的新闻标题而不能使人明白事件之来龙去脉；同样，《左传》若离开《春秋》，不少地方便有指代不清之嫌。如僖公二十八年传文记：“冬，会于温，讨不服也。”仅凭此条记载，我们对会于温的主语一无所知，幸有《春秋》之言：“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可见《左传》不是交代不明，只是承接经文有所省略而已，诸如此例，《左传》中比比皆是。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前言》^⑨中对经与传之间相辅相成、两位一体之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兹不备引。《左传》虽有不少无传之经和无经之传，甚至还有与《春秋》相抵牾之处，但这并不与其解经之作的性质相矛盾。晋杜预在《春秋序》中对此就有精辟的论述：“《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⑩这里清楚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左传》在依经立传的传述意图之外，已经具备了“随义而发”的创作自觉，这也是《左传》能成为伟大的史传文学而被后世传颂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左传》的创作自觉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劝善惩恶的功能与文化反思之用意，它们使《左传》在阐释经义之外，具备了独立的思想价值与文化内涵。首先，是它与《春秋》一脉相承的“劝善惩恶”的道德自觉，这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传文中的“君子曰”与“仲尼曰”之类的评论。杨向奎先生称“君子曰”“乃原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作的论断。这种论断或为其本人所有，或为取自他人的议论。”^⑪无论是当时之说言直论所化，还是作者自身作出的论断，“君子曰”都应看作是左氏的创作自觉与道德立场之体现，而且由于《左传》叙事的完整性和视角的灵活性，比之《春秋》，它的“劝惩”功能体现得更为鲜明充分淋漓酣畅。如襄公三十年的《春秋》

记载了“澶渊之会”的历史事件：“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子、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传文对其进行了详尽之铺展。首先，《左传》对《春秋》进行了重要的史料信息的补充，经文仅仅记录了与会的国家，而传文还记载了各国的与会人员，同时在“宋灾故”之外说明此会之目的是“谋归宋财”。其次，《左传》对《春秋》“义法”进行了阐释。传文把经文不书各国卿大夫之名归咎于他们言而无信救患不力。这两点都再一次证明了《左传》依经立传的性质。但在这种解经的意图之中，它还体现了一种可贵而不迂腐的道德意识。对于《春秋》的这条记述，三传的阐释都是各不相同的。《公羊传》虽然也认为经文这样的处理是对卿大夫们的贬抑，但其所据不过是尊卑贵贱等迂腐之论^②。而《穀梁传》则认为《春秋》其实是在褒扬以晋赵武、楚屈建为首的卿大夫们，所根据的却是完全与“宋灾”扯不上关系的华夷之辨^③，且楚国也并未在此次活动中现身，其牵强之处，自是显而易见。从三传的各言其是中不难看出，阐释经义并无一定的标准，解释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反映的是创作者思想境界之高低与文化眼光之阔狭。

在劝善惩恶的功能之外，《左传》还具备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反思之用意。惟有当作品具备了文化反思之深度，它才能启发人们去探寻隐藏在是非对错后面的更为本质的东西，从而对历史与现实有一个全局性的关照和理解，而不再是非对即错的简单二元思维。在晋卿族身上，《左传》就以一种两难的评价取向传达了其文化反思之苦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左氏对晋卿族的评价取向构成了整部《左传》之文化立场：对日渐没落的旧贵族的既抨击又同情的心理情感，对以晋卿族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既认同又批判的道德立场，这种两难的道德立场说到底就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所带给人的生存困境，它展现的是古老道德文化信守者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不断地拷问人性、审视当下与追问历史的不无痛苦的心路历程。左氏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探求一种恒久的社会公理与道德准则，期望以此来重建社会秩序，燃起乱世人们心中的良知与善念。这种由道德自觉催生的文化使命，正是《左传》创作意识最可贵和最集中的体现。

《左传》抓住春秋时期“霸主政治”与“卿族政治”这两条主线，展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斗争与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趋势与社会发展规律，各国的卿大夫始终在这种发展与变革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长期称霸中原主宰局势的晋国卿族，自然就成了《左传》刻画的重点。在春秋历史将近二分之一的时间里，晋卿族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学界多把三家分晋作为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可见从晋卿族的发展历程中可管窥春秋格局整合重组与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嬗变。对《左传》中晋国卿族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春秋时代的官场政治、伦理文化与历史发展之趋向。

一、春秋格局下的晋国霸业

（一）春秋“霸主政治”的历史分期及其与“卿族政治”的关系

一谈起春秋时代，人们大多以“礼崩乐坏”形容，“礼崩乐坏”说的就是西周“礼乐”制度所维持的封建等级秩序由于上下力量的对比变化而受到了严峻挑战，最明显的变化就发生在“天子——诸侯——大夫——家臣”这个等级序列中。王纲解纽而霸权迭兴——公室失权政在家门——卿权旁落而陪臣执国命，这就是春秋政治格局演变的大致线索，而“霸主政治”的发展则贯串这条线索始终。何为“霸主政治”？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周室衰微王命不行后，由某个强力的诸侯国来代替衰微的共主在中原地区发号施令并担负起保护民族共同体的义务，这个诸侯国的国君就是各诸侯国共同尊奉的盟主，这种政治形态就称之为“霸主政治”。

周室东徙，王纲解纽共主衰微，有实力的诸侯国纷纷在此扰攘之际争夺中原地区的领导权，由此遂开春秋争霸之格局。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即明言春秋以后“政由五伯”。本文之“五霸”采用荀子、墨子的说法，即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④清人恽敬言：“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扫除之，又更七雄者也。”^⑤可见“五霸”就代表了整

整个春秋时期。现代史家也往往把“霸政”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为划分春秋时段的标准。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将春秋三百多年的历史划分为“霸前时期”、“霸政时期”与“霸政衰微时期”三个段落^⑩，而金景芳先生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中则将春秋霸政分为四个阶段^⑪。结合钱先生与金先生的看法，笔者以为春秋可以作如下分期：序幕阶段是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 686 年，凡八十五年；高潮阶段是从公元前 685 年齐桓公即位始，至公元前 621 年晋襄公卒为止，凡六十五年；持续阶段是从公元前 620 年晋灵公即位始，至公元前 546 年宋之盟（第二次弭兵之盟）止，凡七十五年；尾声阶段是从宋之盟至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而分其地，凡九十四年。至此不难看出“霸主政治”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形态，而齐桓与晋文先后创建的霸业则是春秋盛世的最显著标志。当时与后世的人们对霸政的评价大多是积极正面的，因为霸政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起到了协调各国关系以维护中原地区稳定和保护华夏共同圈不受外来侵略的重要作用。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抗戎狄以存邢卫、伐楚以阻其北侵、定襄王之位以安周室、葵丘之会以盟诸夏；晋文公纳襄王杀子带、救宋以报施、败楚城濮以取威定霸。此等尊王攘夷、救患恤难、兴灭继绝之举，当中虽有不少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但在客观上却使华夏族的文明历程不至于在强蛮外力的冲击下骤然中断，同时也创建了一套新的政治秩序来整合华夏共同体，缓解了“礼崩乐坏”的时代环境带给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帅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⑫可见霸政不仅强调政治军事力量，同时更是一种道义力量的集中体现。钱穆先生就把霸者标义归结为四点：尊王、攘夷、禁抑篡弑、裁制兼并。^⑬诚然，在春秋近三百年里，华夏民族的政治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得以确立与维持，不能不说是霸政之功。

在春秋发展史上，“卿族政治”是与“霸主政治”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政治形态，在《左传》，它更是与“霸主政治”并行的叙事主线。所谓“卿族政治”，指的是春秋早中期由“诸侯立家”（《左传·桓公二年》）而产生的卿族群体在国内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发挥的政治影响。它是春秋时期所特有的政治形态，战国之

后，卿权要么衰落，要么已经完成了向新的君权的转变，所以聂淑华把“卿族政治”称为“西周家国一体化的政治模式向战国时期家、国分离的集权政治模式过渡中出现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政治模式”^⑨。“卿族政治”是继“霸主政治”之后出现的一种政治形态，二者间互有损益，而非完全不能相容的政治形态。若说“霸主政治”强调的是国家之间格局的多元化和力量的共生性，是各诸侯国所归属的政治集团的划定；那么“卿族政治”注重的就是国内权力的更迭，是公室与卿族的力量对比与消长。以晋国为例，它的“霸主政治”与“卿族政治”最早是平行发展且相互促进的。晋国为维持霸业，对外频启战端，而它尊贤尚功的任人制度则激发晋卿族在沙场上冒锋镝蹈白刃，可以说晋国的“霸主政治”是“卿族政治”生存壮大的土壤，而“卿族政治”的发展又进一步巩固了晋国的“霸主政治”。但无可否认的是，“卿族政治”与“霸主政治”的关注重心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注重的是私家在国内政治利益的划分中所能占得的份额，后者关注的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承担国际义务所获得的政治尊严，这样一来，“卿族政治”的发展必然会加速“霸主政治”的消亡。鄙意以为，晋国霸业的彻底丧失应在公元前506年的召陵之会，而此时晋国正是六卿专权的时期，也就是说晋国的“卿族政治”正处于高峰期，由此又可见晋之“卿族政治”与“霸主政治”此消彼长对立的一面。

（二）晋国建立霸业之因由及其影响

春秋霸业创始于齐，但齐桓之后，政随人亡，齐国煊赫一时的霸业因齐之内乱而匆匆落下了帷幕。晋文继齐桓而起，以城濮一战创立了晋国霸业，史书常把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位最杰出的春秋霸主并称为“桓文”。与齐国昙花一现的霸业不同，晋国的霸业维持了将近一百三十年，而此后南方吴越的霸业只是强弩之末，春秋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晋国霸业是与春秋霸政相始终的，一部晋国史同时也就是一部春秋霸业史。

晋国在文公建立霸业之前，已经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春秋

初期，晋国已经与齐、秦、楚三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初露峥嵘。《国语集解·郑语》有言：“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②、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盭冒于是乎始启濮”就是对这一状况的描述。晋文侯杀携王定周室为晋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正面的形象。文侯之后，献公大兴侵伐之事以开疆拓土，在他的时代，“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③但献公却因家事处理不当而导致了晋国将近二十年的内乱，晋国的国势也日渐衰弱。而晋文公的返国得位却使晋国扭转颓势，并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国，成为了雄视诸侯的霸国。晋文公建立霸业的始末是《左传》中特为精彩的部分，细读《左传》，不难发现，晋国霸业得以建立，有五个最为关键的因素不可忽视。

首先，是晋国的地理位置优势。晋国的自然地理形势十分优越，有“表里山河”之誉。它扼居河曲一带，西至河西，东逾太行，为晋人提供了据险而守备豫不虞的重要条件。当晋文公在晋楚之战一触即发之时举棋不定，狐偃宽慰激励之：“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狐偃此言就充分表明晋人之所以能外攻内守游刃有余，晋之险要地势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晋国与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为邻，这就为其开拓疆土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晋献公时“二五耦”有言：“狄之广漠，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可见晋之迅速壮大与其拥有充分的发展空间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是晋国的血缘优势。晋国的始封君唐叔为武王之嗣，晋与周世为叔侄之国，其主盟中原，在时人心中有着天然的正统合法性。《国语集解·晋语四》记载了卫国宁庄子之言：“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将在武族。苟姬未绝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晋实昌……”不论是异姓大国之姜齐，还是称霸西戎之强秦，抑或问鼎周室之南楚，在宗法血缘方面，都不具备晋优势之万一。血缘优势又转化为文化优势，它使得华夏共同体极易建立对晋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一旦产生，以晋国为主导的政治秩序也就不难建立了。城濮之战前，楚国几乎控制了黄河以南的所有

国家，但这些国家，尤其是向来具有文化优越感的华夏诸国，对楚畏而不服，并时时渴望华夏圈中能产生一位强力人物来充任中原霸主，使他们不必俯首于南蛮之楚。这也是城濮之战后，楚国同盟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晋国所面临的历史机遇。晋文公称霸之前的国际形势是空前的混乱。子带乱周，天子出逃；中原地区戎祸盛行，狄人攻入王畿致使天子狼狈出逃。兼楚势日盛，黄河以南的所有地区几乎都被其控制。中原局势岌岌可危，真可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②在此形势下，诸夏亟需一位强力人物来主持大局，于是晋文公的霸业便应运而生了。后人对晋文公的“尊王攘夷”之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有言：“晋伯所基，惟在定王一举。”^③在这一点上，晋国的君臣也是了然于胸的。晋文公二年（鲁僖公二十五年），秦穆公将帅师纳王，狐偃就对晋文公明言：“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除了以“尊王”义举延长了周室的命祚外，晋文霸业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一度有效阻止了楚国对中原地区的侵扰。顾栋高《春秋大师表·卷二十六叙》说：“齐桓攘夷之功，十分不及晋文之一。何也？……齐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灭弦，又踰年而楚人围许、灭黄、伐徐，楚之桀敖不能稍减其分毫。”^④诚然，齐桓召陵之盟，对楚国并未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故不能敛抑楚国扩张之锋芒；但城濮一战，晋人却是大挫楚国之锐气，楚国在中原的同盟全线瓦解，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楚人的北进，也为晋国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次，应归功于晋国的国家建制。首先，在政治上实施尊贤尚功的用人制度。晋国独有的“国无公族”的政治结构，使得晋国从西周以来确立的“任人唯亲”的政治传统转向了“尊贤尚功”的任人制度，因此晋国凡有机会参与到称霸事业中的各阶层无不尽心竭力勇猛精进，通过为国效力而获得封官进爵的机会，这无疑对晋国争夺霸业是大有裨益的。其次是军事建制上的层级分明、统辖有序。晋文公四年（鲁僖公二十七年），文公“蒐于被庐，作三军”，为晋国创立了上、中、下三军之编制，中军地位最高，上军其次，下军次之。上一军级对下一军级有统领权，而本军佐则直接听从本军将

的指挥。晋国的军制虽有数次变迁，但层级分明的管理模式却一直被遵循，故在多数情况下都能严明军纪令行禁止，从而形成一支战斗力强的高素质军队，这是晋国能够战胜强楚而取得霸权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后不能不提及的就是晋人的政治文化理念。春秋争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强力决胜负的过程，军事实力在其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仅靠强力征伐并不能使人真心归顺，即使能建立霸业也必定无法长久维持，在政权暴力机构之外，统治者还必须有一套稳固的价值观念去引导民众、怀柔远人，这是比在刀光剑影中战胜对手更为重要的较量。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晋国之所以能建立霸业，与晋国君臣能够树立并坚守正确的政治理念与文化信仰有着莫大的关联，笔者对此以五点进行论述。

首先，晋人充分认识到了“尊王”事业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春秋之世，周王虽然“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⑤，但在诸侯当中还是有着道德意义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之前齐桓之称霸也要打出“尊王”的旗号，故狐偃目光深远地提出勤王以定霸，文公则从善如流以成德义之名。

第二，是他们清楚地界定“小惠”与“大耻”，打破思想枷锁而与楚决战中原。由于晋文公在流亡期间曾经受到过楚成王的恩惠，故在城濮一战中颇有顾虑。文公在主观意愿上当然希望打败楚国而建立霸业，但又害怕担上“背惠食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之恶名，故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而其谋臣栾枝则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栾枝以为，楚王厚待出亡之重耳，乃为“小惠”；而楚国兼并吞灭汉水之北的姬姓之国，则是身为“周之同姓”的晋人的“大耻”。栾枝把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怨得失，把战与不战的问题提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其实，春秋时期的诸侯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主义者，正如张德苏先生所言，此时的道德准则是“作为利害选择的一个被综合考虑的因素”^⑥，文公的犹疑的焦点并不真正在于“楚惠”，而在于与楚交战将会给个体名誉甚至国家声誉所带来的影响。栾枝答语的目的在于挑明，文公争夺霸业的举动是建立在追求社会稳定和维护民族利益的基础上的，它只会为